

“居间者”的模糊图像

——从大希律钱币看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初期的罗马—犹太关系*

操顺慈 杨梦**

【摘要】钱币作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于一身的历史载体,无声地记述着社会的发展特征与集体记忆。犹太王大希律发行的诸多刻有“第三年”的钱币上的图案模棱两可,兼具源于罗马和犹太文化的内涵。这些图案的模糊性体现了大希律作为“既非罗马,又非犹太”的“居间者”,调和并平衡双方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潜在对立的努力,也揭示出中央与地方和谐共处的表面下基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矛盾。

【关键词】犹太钱币;大希律;罗马—犹太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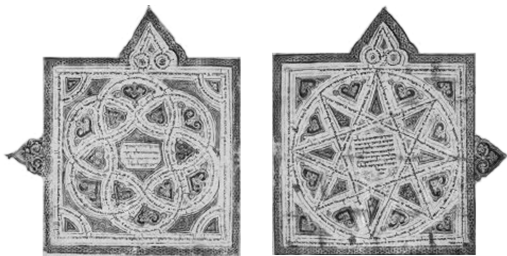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批镌有希腊文“第三年”字样的银质钱币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兴趣。这批钱币铸造于撒马利亚(Samaria),由当时犹太地区(Judea)的统治者大希律(Herod the Great)发行。大多钱币在两面镌刻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而有趣的是,这些图案同时具有来自希腊—罗马和犹太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内涵。

考古及历史学界已有许多论文关注大希律钱币图案的模棱两可。部分学者试图澄清模糊图案的涵义,大卫·雅格布森(David Jacobson)、大卫·亨迪恩(David Hendin)等学者都论证了罗马文化解读相比犹太文化的优越性^①,并进一步指出大希律以具有罗马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表达对帝国及其领袖的忠实。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二战期间在华德裔犹太难民的文化生活”(20BSS058)阶段性成果。

** 操顺慈,美国波士顿学院哲学专业研究生;杨梦,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

①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and David B. Hendin, “Pomegranate or Poppy: What Lies between the Cornucopias on Hasmonaean Coins?” *Near Eastern Archeology* 84 (September 2021): 206-215; David M. Jacobson, “An Act of Homage to Herod the Great on His Largest Coin,” *Strata: Journal of the Anglo-Israel Archeological Society* 40 (January 2022): 101-121.



与之不同,本文的目的不是在相互矛盾的两种解读中做出决断,而是考察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图案的模糊性本身及其所反映的犹太社会的特征。因此本文首先将详细描述图案的模糊性这一现象,尽量忠实展现依于两种文明的图案内涵。

学界也已有部分研究着眼于模糊性和犹太社会的关联。如宋立宏以钱币为线索考察整个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点,分析钱币对强化集体记忆、促进民族认同的作用。^①然而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犹太社会的内部特点在时间中的嬗变,而较少涉及犹太地区和罗马帝国(共和国)之间、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互动。本文则只聚焦于大希律的统治时期,分析其钱币的模糊性背后可能具有的政治理念,并在犹太民族认同之外更多地探讨其与罗马统治的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以具体图案为例对钱币所具备的模糊性进行详细说明,第二部分则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分析钱币的模糊性背后可能的政治意图。

一、模糊图案的双重解读空间

大希律在统治犹太地区的近四十年中制造和发行过大量钱币,然而仅有很少一部分用希腊文标注了制造年份——“第三年”(LT),且几乎全部标有“第三年”的钱币都来自撒马利亚造币厂。

学界关于“第三年”的具体指代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三年”是公元前38或37年,即从公元前40年大希律正式被罗马元老院封为犹太王算起的第三年。^②根据约瑟夫《犹太古史》的记载^③,这一年他打败了哈斯蒙尼家族的马泰提亚·安提古(Mattathias Antigonus)并占领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地区的唯一统治者,故在钱币上刻“第三年”以记录这一成就。彼得·理查德森(Peter Richardson)在对关于“第三年”的指代进行详尽的综述和分析之后,认为现有证据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只是这一批硬币的铸造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39年。^④

^① 宋立宏 Song Lihong,《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Jewis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With a Focus on Ancient Jewish Coins],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013年第3期[2013, Issue 3],106—116,191。

^② 例如 Josef Meyshan,“Chronology of the Coins of the Herodian Dynasty,” in *Essays in Jewish Numismatics* (Jerusalem: Israel Numismatic Society, 1968)。

^③ 参见 Paul Maier 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Josephus: The Essential Works],王志勇 Wang Zhiyong 译(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243。

^④ 参见 Peter Richardson,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211-21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雅科夫·梅舒雷尔(Ya'akov Meshorer)提出了不同观点。^① 他认为纪年的起点应当是公元前42年,即希律及其兄长被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任命为犹太地区的分封王(tetrarch)的这一年。^② 由此看来“第三年”应当指公元前40年,希律在钱币上标注这一年份以记录罗马人授予他王位的事件。几乎全部刻有“第三年”的钱币来自撒马利亚,说明钱币制造和发行期间撒马利亚更可能是希律的统治中心,而耶路撒冷应尚在安提古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批钱币应流通于希律与安提古对峙争权的时期。

这部分钱币谨遵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的诫命,不饰人像,而是在正反面均装饰三足祭坛、头盔、蛇杖、丰饶角等图案。然而部分图案模棱两可,既可以被解释为频繁见诸同时代的希腊罗马钱币、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符号,也可以被视作外形相似但独具犹太文化特征的事物。本部分将以两款钱币的四种图案为例进行具体剖析。

(一)三足祭坛和头盔

三足祭坛(tripod,见图1)是罗马人向太阳神阿波罗进献食物的标志性器物。三足祭坛作为钱币的装饰图案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见图2)。



图1 三足祭坛

(公元前6世纪初。高75.2厘米,宽44.5厘米,上方可架设铜质器皿。资料来源:
<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open-access>)

^① 参见 Ya'akov Meshorer, *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 From the Persian Period to Bar Kokhba* (Jerusalem: Yad Ben-Zvi Press, 2001), 61-62。

^② 参见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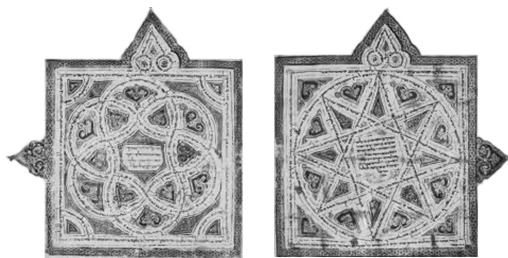


图2 装饰三足祭坛的希腊银币

[公元前 425—前 350 年, 制造于克罗顿 (Croton)。直径 2.4 厘米, 重 8.01 克。一面(左图)镌刻上置容器的三足祭坛。资料来源: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尽管大致保留了三足祭坛的外形特征, 大希律制造的钱币上一般被认为“三足祭坛”的图案(见图 3 左)的几个细节却与希腊钱币大相径庭: 比起希腊钱币, 大希律钱币上的“三足祭坛”顶部面积更小, 左右两侧有凸起, 底部也更厚实; 希腊钱币上三足间距较大, 而大希律钱币的三足紧凑、不易区分。



图3 大希律三足祭坛与头盔硬币

(刻有“第三年”希腊文字样。直径 2.5 厘米, 重 6.27 克。两面分别饰有一般被认为三足祭坛和头盔的图案。资料来源: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相比希腊钱币, 大希律铸造的钱币上的“三足祭坛”明显更为粗糙。然而大希律发行钱币的时间相距图 2 中希腊钱币的估测制造年代已有三百余年, 且撒马利亚是当时重要的统治中心和造币地, 图 3 钱币镌刻的“三足祭坛”的粗糙应当不是由技术欠佳所致。一种对于大希律钱币与希腊钱币差异的替代性解释是, 大希律在铸造这枚硬币时意图以该图案表征有别于阿波罗崇拜的文化意涵。

大希律粗糙的“三足祭坛”可被犹太人视作耶路撒冷圣殿中的精金祭坛 (golden altar/altar of incense)。^① 《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会幕中, 香炉被置于用皂荚树或洋槐制成并在外表包金的祭坛上, 摩西的兄弟亚伦每日在香炉中烧馨

^① 参见 W. Wirgin, “The Large Bronze Coin of Herod I,” *The Numismatic Circular* 68 (1960): 18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香料祭祀。祭坛顶部为正方形,有角状装饰,高度为顶部边长的两倍。^①图3中上部的半圆结构代表香炉,而下方的支撑物为祭坛。特别地,半圆结构左右两侧伸出的部分可被视为祭坛顶端的角状装饰。由于大希律的这枚钱币并未清晰展示三足鼎立,而只是笼统地表现了坛状结构,故将之解读为香炉和祭坛也有道理。

巴鲁克·卡奈尔(Baruch Kanael)在分析大希律在耶路撒冷制造的另一款钱币(见图4)时指出,右图的“三脚祭桌”(也是阿波罗崇拜的符号)可以被犹太人解读为耶路撒冷圣殿的无酵饼陈列桌。^②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却仍不免牵强。沿着他的思路,图3中与实物相去甚远的“三足祭坛”,反而更可能被解读为无酵饼陈列桌。在与大希律角逐犹太地区唯一统治者的安提古发行的钱币上,无酵饼陈列桌的典型特征被基本保留(见图5左)。对比图3和图5,可以发现大希律的“三足祭坛”类似该陈列桌的侧视图,即从左右两侧观察时,两个高耸的结构重叠带来的视觉效果。而即便将图3中的“三足祭坛”视为无酵饼陈列桌,大希律和安提古钱币的图案也大相径庭,前者模棱两可,而后者十分清晰,这一区别也可能与二人的政治立场及与罗马关系的差异相关。



图4 大希律三脚祭桌钱币

[刻有“第三年”希腊文字样。直径1.8厘米,重2.82克。其中一面(右图)饰有一般被认为三脚祭桌的图案。资料来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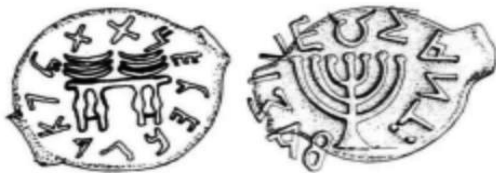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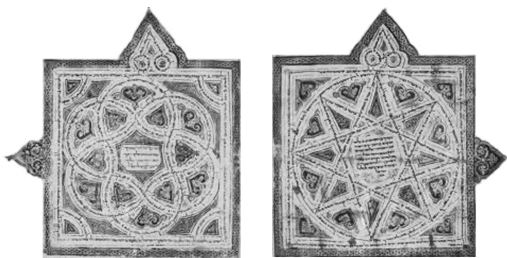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图5 安提古无酵饼陈列桌钱币

[资料来源:徐龙,《犹太与以色列国钱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42]

“三足祭坛”反面的图案(见图3右)更加模棱两可,也引发学界更多的争议。

① 参见《出埃及记》30。

② 参见 Baruch Kanael, “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26 (May 1963): 49。



有学者将之视为头盔,半圆形下方的图案代表罗马式头盔的护颈,而希律在钱币上装饰这一图案以象征自己的统治权威。大卫·雅格布森则持有不同观点。他将该图案解读为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之子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丢刻斯(Pollux)头戴的圆锥帽。他们的形象常见于希腊罗马的钱币上,多戴有顶端装饰星形的圆锥帽(见图6),而大希律钱币的“头盔”上恰好也有星形标志。雅格布森进一步推测,神话中,凡人与神明的后代被称作“hero”,而大希律的希腊名涵义恰为“hero-like”,因此他可能以此图案展示自己作为罗马承认的犹太王的荣耀。^①



图6 撒马利亚科雷神庙(Temple of Kore)的圆锥帽石灰石浮雕板

[资料来源:David M. Jacobson, “An Act of Homage to Herod the Great on His Largest Coin,” *Strata: Journal of the Anglo-Israel Archeological Society* 40 (January 2022): 111]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该图案并非头盔,而是上文提及的耶路撒冷圣殿中用于崇拜和祭祀的香炉(Ketoret incense)。^② 香炉和背面的祭坛相呼应,传递基于《圣经》的文化和信仰内涵。

(二) 蛇杖和罌粟

大希律在撒马利亚制造的另一款钱币也充满争议(见图7)。大部分学者认为左侧的图案是希腊神话中信使之神赫耳墨斯(Hermes,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

^①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An Act of Homage to Herod the Great on His Largest Coin,” 107。但早在 20 年前就已有关于这种解读的合理性的辩论,参见 David M. Jacobson, “Herod the Great Shows His True Color,”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64 (September 2001): 100-104; Charles Sandy Brenner, “Herod the Great Remains True to Form,”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64 (September 2001): 212-214。

^② 参见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利, Mercury)的双蛇杖(caduceus),杖身被两条蛇环绕,杖头有张开的双翼。蛇杖图案的钱币在安东尼掌权时就在罗马发行^①,是罗马共和国钱币的典型装饰图案(见图8)。雅格布森指出,大希律以此图案致敬奥古斯都,将皇帝作为赫耳墨斯现世的象征。^②但是这一解释并不适用于在撒马利亚制造发行的钱币,因为罗马帝国尚未建立,大希律和屋大维·恺撒之间的私人情谊也比较淡薄。^③但希律通过雕饰双蛇杖表达对希腊罗马文化的亲附是可以肯定的。



图7 大希律蛇杖与罌粟钱币

(刻有“第三年”希腊文字样。直径1.7厘米,重3.08克。两面分别饰有一般被认为蛇杖和罌粟的图案。资料来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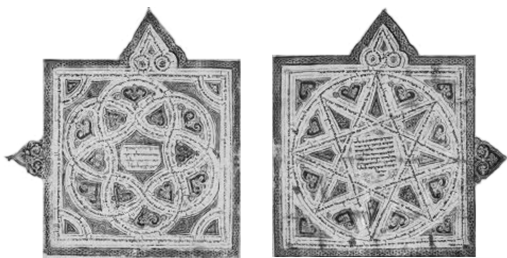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图8 罗马共和国赫耳墨斯银币

[公元前82年制造于罗马。重3.66克。一面装饰有赫耳墨斯(墨丘利)的头像,其肩膀上是被指认为蛇杖的图案。资料来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① 参见徐龙,《犹太与以色列国钱币》,43。

②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erse of Herod’s Largest Coin,” *Museum Notes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31 (January 1986): 161。

③ 据约瑟夫《犹太古史》,希律和屋大维的友谊始于亚克兴战役之后。参见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249—251。



然而在犹太教传统中,摩西的手杖也与蛇息息相关。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①,摩西和亚伦面见法老,要求将犹太人带离埃及;亚伦在耶和华的吩咐下将摩西的手杖丢在法老面前,手杖变成蛇;法老的魔法师也能使杖变蛇,但摩西的手杖又变作一条巨蟒,吞噬了埃及人的杖。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图 5 左侧所饰图案为摩西蛇杖。^②

蛇杖图案的背面是带有花冠和枝叶的果实图案(见图 5 右)。该图案既可以被理解为和希腊罗马神话高度相关的罌粟(见图 9 左),也可以被解读为与之外表相似的犹太人喜爱的石榴(见图 9 右)。



图 9 罌粟和石榴

(资料来源: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罌粟是希腊神话中农业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 即罗马神话中的刻瑞斯, Ceres)的象征。罌粟结籽众多,因而成为寄寓丰产愿望的符号。同时代的罗马艺术作品时常将罌粟、谷穗和丰饶角(cornucopia)装饰在德墨忒尔的形象左右,如公元 20 年铸造的扮作德墨忒尔的李维娅(Livia)像的右手中就握有谷物和罌粟(见图 10)。^③ 罗马人祭祀农业女神,向她祈求丰收,这种崇拜向整个地中海传播,也影响了犹太地区。在撒马利亚,大希律甚至为此建造了一座异教神庙,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座神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非常受欢迎,也找到了德墨忒尔之女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 即罗马神话中的普罗塞皮娜, Proserpina)的塑

^① 在《出埃及记》4:17 中,耶和华将行神迹的杖赐予摩西和亚伦。而在 7:8—13 中,在法老面前,亚伦掷出杖行神迹,将杖变成蛇。直接承接上帝命令的是摩西,亚伦只是听从摩西的安排将杖扔在法老面前,因此一般将蛇杖归属于摩西。

^② 参见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3。

^③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and David B. Hendin, “Pomegranate or Poppy: What Lies between the Cornucopias on Hasmonaean Coins?” 20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像^①。丰饶角和罌粟是常见搭配,加之德墨忒尔崇拜在犹太地区的盛行,将大希律钱币上的图案解读为罌粟相当可信。



图 10 扮作德墨忒尔的李维娅像及其右手放大图

[约公元前 40—前 20 年。高 2.53 米。雕像右手握有丰饶角。圆圈为笔者标出,表示罌粟的位置。资料来源:<https://collections.louvre.fr/en/page/apropos>]

然而,该图案在犹太人眼中也可能意味着深受他们喜爱的石榴。石榴是应许之地的七种承载祝福的作物之一。^②此外,据传说石榴有 613 颗籽粒,恰好对应摩西领受的上帝的 613 条诫命,因而石榴在犹太教传统中颇受重视。同时,石榴“多子”,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作为生育的象征出现。

但是即便把图案视作石榴,它仍然具有浓厚的希腊罗马味道,且依然和农业女神紧密相关。德墨忒尔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Hades,即罗马神话中的普鲁托 Pluto)掳到冥界,食用石榴籽后便无法返回阳间,因而石榴的形象常常伴随珀耳塞福涅出现,且罗马人常将德墨忒尔母女作为丰饶的象征一并崇拜祭祀。

对比图 9 左右两图,我们能够发现其实石榴和罌粟可以通过细节加以区分。罌粟的花萼扁平,萼片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呈放射状,而石榴的萼片则形如王冠。有趣的是,这个细节在第一次犹太战争期间(66—70 年)发行的钱币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③(见图 11 左)——冠状的萼片分明表示图案为石榴,且钱币并未装饰丰饶角,更能说明石榴承载的是犹太文明的内涵。

^① 参见 Ya'akov Meshorer, *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 From the Persian Period to Bar Kokhba*, 64。

^② 参见 Deuteronomy 8:8。

^③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and David B. Hendin, “Pomegranate or Poppy: What Lies between the Cornucopias on Hasmonaean Coins?”,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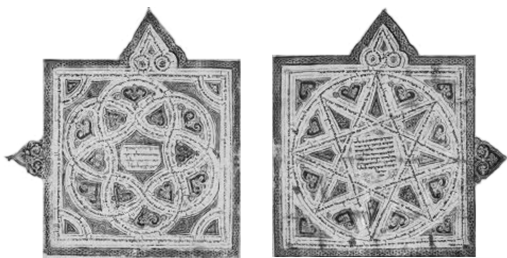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图 11 第一次犹太战争的石榴钱币

[66—67 年制造于耶路撒冷,重 14.14 克。其中一面(左图)饰有三颗石榴。资料来源: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在第一次犹太战争期间,罗马—犹太关系相比大希律在位时已发生根本转变。作为罗马代理人的希律王朝已被起义者推翻。犹太人视罗马人为压迫者,两种文明之间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矛盾以战争的形式直接爆发。而钱币上鲜明的石榴图案正是这一时期犹太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映。这一图案也被 1952 年以色列发行的 500 普鲁塔硬币直接继承^①,作为经历千百年的流散终于建立独立国家的犹太人对这段民族记忆的致敬。这为理解大希律钱币上模棱两可的图案提供了启示。

二、模糊图案的政治意图

在考察大希律钱币图案的双重解读空间后,本部分将分析图案的模糊性所反映的造币者的政治意图,以及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罗马—犹太关系的特点。

(一) 统治合法性与意义建构

犹太地区被纳入罗马统治始于公元前 63 年庞培(Gnaeus Pompeius)进驻耶路撒冷。时任犹太祭司的哈斯蒙尼(Hasmonean)家族的两兄弟希尔坎努斯(Hyrchanus)和亚里士多布鲁(Aristobulus)为争夺王位,争相获取罗马人的支持。庞培帮助希尔坎努斯打败亚里士多布鲁,而犹太人将王国的独立地位拱手相让,自此成为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②

从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初期,罗马统治者不断调整犹太政策,以期最大化自身在东方的利益。比起典型中央集权帝国的中枢政府与地方行省的关系,罗

^① 参见徐龙,《犹太与以色列国钱币》,242。

^② 参见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228—23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马和犹太的关联更类似封建制的领主和附庸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契约。罗马给予犹太政治上的自治权,即在犹太扶植代理人或傀儡国王(“client” prince),负责处理地方行政事宜;同时,犹太社会自身表面的“完整性”得以保留^①,尤其是他们能够自由地保持犹太教信仰和祖先传统,在会堂中集会,且免除对皇帝的崇拜^②。作为交换,犹太负有保障罗马东部边境稳定的义务,并需要承担一定的赋税。

希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罗马的“代理人”的。他父亲的家族来自以土买(Idumaea),迟至公元前2世纪才皈依犹太教,而母亲则是纳巴泰(Nabataea)的阿拉伯人。^③大希律的父亲安提帕特(Antipater)是希尔坎努斯的朋友和副手,受到恺撒的信任和重用,成为罗马安置在哈斯蒙尼祭司浮于表面的统治之下的实权人物。安提帕特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法赛尔(Phasaël)和希律任命为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总督。由此可见,与哈斯蒙尼家族不同,希律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并非扎根于犹太宗教与文化,而是被罗马人“横空插入”犹太社会,在罗马人的扶植下一步步攫取了犹太地区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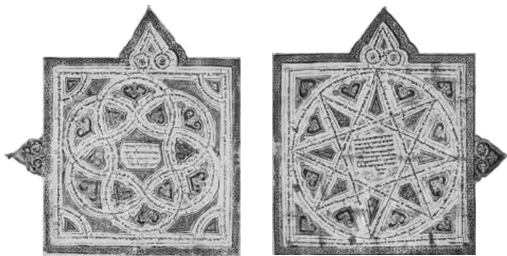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而大希律刻有“第三年”的钱币的制造和发行正值他与马泰提亚·安提古的战争期间。安提古是哈斯蒙尼家族的亚里士多布鲁的儿子,被帕提亚人(Parthians)承认为犹太王,并在他们的支援下攻占了耶路撒冷,希律的兄长法赛尔自杀。公元前40年,希律前往罗马寻求军事援助。元老院投票表决支援希律,并认为应当封他为犹太王。他尤其得到了罗马的实权者安东尼和屋大维·恺撒的承认,他们念及他和他的父亲对罗马的忠诚,正式将他视为罗马在犹太地区统治的新代理人,并出兵帮助希律击败安提古成为犹太地区唯一的掌权者。^④这一时期大希律的政治任务一方面是得到并巩固罗马统治者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要向他的臣民表明自己统治相比安提古的合法性。而撒马利亚造币厂发行的“第三年”的钱币所蕴含的双重解读空间也恰恰反映了双重的政治意图。

① 参见 Hendrikus A. M. van Wijlick 亨德里库斯·A. M. 范·韦里克,〈古代帝国中枢与地方政治之互动——公元前44年至前40年的犹太与罗马帝国〉[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Its Localities: Judaea and the Roman Empire from 44 to 40 BC],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19年第2期[2019, Issue 2],107。

② 参见安凤仙 An Fengxian,〈古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对犹太的策略〉[The Strategies of Ancient Rome towards the Jews from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mpire],于《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2020年第2期[2020, Issue 2],66。

③ 参见 Martin Goodman, *Herod the Great: Jewish King in a Roman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Jewish Lives, 2024), 20。

④ 参见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238—239。



钱币有限的空间只能容纳图案,铸币者不可能通过文字或其他争议更小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图或对受众的引导清楚分明地呈现在钱币上。这就给予了受众——大希律的领土上交织着犹太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极大的理解自由。换言之,受众自主地参与到符号含义的构建过程中。他们对于图案的识别不是“自下而上”的感知和分析,而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历史文化情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自上而下”地制造图案的意义(sense-making)。通过教育、仪轨等或显或隐的方式,一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氛围塑造着个体与世界互动的视角和习惯。受众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识别的图案也可能不同,进而读出不同的象征含义: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还牵连出与之相关的一段民族集体记忆、一整套意义系统。

例如面对模棱两可的植物图案时,罗马人在将其称为罌粟时就已然建立了与农业女神的联系,也就间接地读懂了大希律对罗马神话的倾慕。而犹太人将其界定为“石榴”,自然地牵连出《圣经》里石榴多子和福祉的象征涵义,同时也明白了他对犹太传统的尊重。希律由此以一种潜移默化但深得人心的方式反击了政敌安提古对他出身的攻击——“半个犹太人”(a half-Jew)^①。大希律领土上的各族人民不是政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反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主动性——钱币上诸多模糊图案意义的建构是由铸币者和观众共同完成的,是一个双方博弈过程。

受众建构起来的不仅是钱币图案的涵义,更是大希律自身的形象和立场。罗马统治者眼中的大希律热衷于罗马文化,是罗马忠实的附庸;而犹太贵族和平民则能感受到这位“半个犹太人”对他们的宗教文化传统的接纳和尊重,逐步承认他作为犹太王的合法性。他的受众将他的意图和形象塑造成符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诉求的样态,使得他的统治能同时得到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承认,进而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与之不同,安提古并没有得到罗马的扶植,哈斯蒙尼家族的出身也使得他在犹太地区的统治合法性相比希律具有天然的优势。相应地,他发行的钱币(见图5)就十分清晰地展现了犹太文化符号无酵饼陈列桌和七臂烛台,无需受众参与意义的构建。二者的对比使我们能够更好理解大希律复杂的政治立场和意图。

(二)“居间者”身份与罗马—犹太关系

前文已经提及,公元前63年后犹太地区已被划入罗马统治范围,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权利和义务交换的政治关系。然而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之

^① Martin Goodman, *Herod the Great: Jewish King in a Roman World*, 2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下,涌动着罗马与犹太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差异甚至矛盾。罗马毕竟剥夺了犹太地区的自持性,结束了犹太人维持了八十年的独立地位,对于犹太人而言,寄人篱下的“大卫之国”从根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同时,罗马的多神教信仰与模糊的人神边界也是决不能与犹太一神教传统兼容的。也就是说,对于犹太人而言,罗马始终扮演着“庇护者”和“威胁者”的双重角色。一旦所谓“共同利益”的表面现象被击碎,罗马和犹太很有可能会立即陷入激烈的冲突。

这种和谐之下压抑矛盾的关系成就了希律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鉴于罗马和犹太在政治、宗教、生活方式上的诸多差异,委派罗马总督、强行推广罗马的政治秩序和宗教文化显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因而“因地制宜”,以犹太人自治的方式管理这片飞地成为巩固帝国边境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如果把犹太地区的自治权交给血统纯正的犹太家族,那么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自己在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号召力,抓住时机脱离罗马统治。由此可见,作为“既非罗马,又非犹太”的居间者,希律及其家族正中罗马统治者的心怀。

这一“居间者”的身份虽然为希律家族赢得了权力,却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危险。罗马和犹太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矛盾并未因为犹太地区被纳入版图而就此消失,而大希律正处在随时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旋涡中间。他是中央和地方政治斗争参与者之间的中介人^①,如同一条脆弱的扁担,平衡着沉重的两股纠缠和对立的政治力量,稍有不慎则冲突一触即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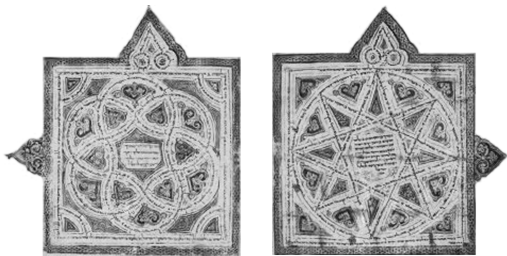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大希律在罗马支持下与安提古的战争便是他作为“居间者”的政治实践的开端。此后直至公元前4年去世,他一直和罗马的统治者保持着密切的私交。他倒戈屋大维并与之成为亲密朋友,为他在帝国建立后坐稳宝座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获得了“罗马人的朋友”“恺撒的朋友”等荣誉头衔。他对罗马文化的了解和热忱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允许他将自己的子女送往罗马接受教育。^②他在犹太地区兴建异教神庙,但也完成了对耶路撒冷圣殿的修复和扩建。^③他在耶路撒冷制造和发行的钱币也依然延续了部分图案的双重解读空间,允许土地上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主动地将他的形象和统治搭建成符合他们需要和利益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无法断言大希律是故意地、精心地挑选和设计了这一系

^① 参见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2。

^② 参见 John Curran, “Philorhomaioi: The Herods between Rome and Jerusalem,”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45 (September 2014): 499。

^③ 参见保罗·梅尔,《约瑟夫著作精选》,256。



列模糊图案以供受众自行揣测品评,而是只能停留在一个较弱但依然不乏启发性的结论:从结果上说,钱币图案的模糊性正是大希律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巧妙地隐匿起来的方式,这些图案蕴含的希腊—罗马和犹太文明的解读空间将理解和表达的负担转移给受众,进而允许他们“各取所需”。

而大希律显然清楚,模棱两可的钱币图案及其他政治实践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计,根本不可能消除中央与地方深刻长久的矛盾——七十年后,希律家族被犹太起义者迅速推翻、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圣殿就是历史的明证。而在起义者发行的钱币上,清楚分明的石榴也不再需要受众的主动辨识和建构,而是将发行者争取国家独立的意图直接地传达出去,表明罗马和犹太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已被打破,受众和造币者也不再博弈,而是同仇敌忾。对于大希律,他的目的仅在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他之所以能采取以如此狡黠的方式,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到了帝国中枢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政治的表、里具有可分离性。表面上,中枢和地方维持着基于权利和义务的交换关系,基本的和平和稳定得到保证,而实际上,政治和文化的冲突在暗中涌动,随时可能以激烈的形式爆发。政治上建立在差异之上的和谐关系的维持,正和文化领域以货币图案和意义的解体为代表的行动密不可分:公共可见的图案不会明确表达政治立场,维系中枢与地方表面上的和谐共处;而图案背后基于民族文化的复杂意义则被巧妙地压抑到私人领域,在不同文化和政治群体内部被私密地建构,进而将威胁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种种矛盾藏到幕后。

三、结语

本文以大希律发行的刻有“第三年”的硬币上的模糊图案为切口,反映罗马共和国末期及帝国初期中枢与犹太地区的复杂关系。大希律利用图像和意义的可解体关系,以及制造者和受众对图像意义的双重建构,维系了帝国中枢和附属国之间表面的平衡和稳定。暧昧的图案折射出地方统治者身份的居间性,以及政治表面的统一与深层的分裂之间的张力。